

第12次《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综述

胡世厚

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 郑州 450002

第12次《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于1999年9月15日至19日在山西省清徐县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9个省市和香港、台湾以及韩国、日本的学者共90位,提交论文67篇。与会学者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就作者和小说的有关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新见颇多,反映了两年来《三国演义》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水平。现将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于下:

一、罗贯中的籍贯、《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版本有新说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素有“太原”、“东原”之争。这次会议学者仍很关注这一问题。刘世德根据《录鬼簿续编》,详列七条理由,论证罗贯中的原籍太原,寄籍钱塘,认为“东原”说产生于蒋大器的序文,而序文“东原”是“太原”的讹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信任宁可给予明初的和罗贯中同时而又稔熟的贾仲明,也不给予那弘治时的陌生人蒋大器”。陈松柏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不是贾仲明,在没有新的确凿的证据之前,只能判定在无名氏名下。罗贯中的忘年交提供的材料是研究罗氏的最可靠的材料,关于罗贯中的籍贯,这个太原说显然较有说服力,“只能以《录鬼簿续编》为据,将罗贯中的原籍定在山西太原”。并以无名氏生平为参照,推论罗贯中生于1318年左右,卒年很难料定,存疑;至正甲辰(1364)之前,罗贯中没有创作小说。这次会议在清徐召开,是因为孟繁仁先生考证罗贯中的祖籍在太原的清徐。因而有的学者赞同孟的观点。郭维忠等从方言词语角度,考析罗贯中著作中的方言词语与清徐县的方言词语相同,认为这是罗贯中祖籍清徐的又一佐证。有的学者认为孟繁仁据罗氏家谱考证罗贯中是清徐人,只是推论,家谱并无罗本之名,难作定论。

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历来有宋代、元代中后期、元末明初、明中叶多种说法。杜贵晨据新发现的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考证,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今存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经过明初人改动过的。上田望从明清出版文化角度考析,认为如果相信《录鬼簿》的记载,太原罗本是生于元末明初的人。按照当时的出版情况,流浪四方的杂剧作家罗本得不到足本的《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纲目》,并依据这些书写成大作《三国演义》。只有到了“明代中叶社会稳定下来,刻书产业日益发展,不难得到大部头的历史书,这样才能安祥地写《三国演义》”。万润保考析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意图,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于明初。作者有一种恋宋情节,主张驱除胡元,恢复故宋。但元末

群雄逐鹿的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暴君取得了天下。所以作者便借汉末史实创作小说,以影射元末这段历史,表达人力无法扭转历史车轮的无奈心情”。

与成书年代有关的是版本问题。李伟实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于明中叶弘治初年成书,以抄本形式流传。嘉靖壬午(元年)刊本,是为《三国志演义》的第一个刻本,叶逢春刊本是至今所见“志传”系统的最早刻本。李伟实把毛本《三国演义》与“通俗演义”和“志传”两大系统中有代表性的八种版本,进行比较,详细调查,认为“毛氏父子把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两个系统的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统统贬为俗本,而毛氏自称得见的‘原本’或‘据此较正的’古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的存在。实际上毛氏所说的那个‘原本’或‘古本’,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靠托古来抬高毛本的地位”。上田望认为“毛本整体含有封建道德色彩,而且改写者毛氏父子注重小说的启蒙教育功能,因此毛本成为三百年来最流行的畅销书”。马成生认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是叶昼伪托,但并非叶昼一人;李批在宣扬忠君爱国思想、民本思想与批判假道学方面与当时的进步思想一致,同时对《三国演义》的情节结构、人物性格方面也有一些粗浅的评析,且多为后来批评者所采用,因此应该重视这一早期的批评本。

二、思想内容有新的见解

会上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深入讨论思想内容问题。张靖龙从自为进取、争利求名、顺时乘势、藉权贵因、朝秦暮楚、崇计尚诈等纵横家的基本特征出发,探讨《三国志通俗演义》崇尚纵横的乱世情怀及其文化意蕴。认为“乱世尚纵横,《三国志通俗演义》在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规范方面与‘思无邪’的传统道德观念截然对立,正是小说形成时期作者与整个社会心态的真实反映”。“《三国志通俗演义》自然不能为封建大一统时期的风化政教观念所认同,毛宗岗父子改编《三国》,其矛头之一便是纵横。不过无纵横便非《三国》,而纵横之味却因此而严重淡化”。宋克夫分析了罗贯中的杂剧《风云会》表现的“尊王贱霸”思想,认为罗贯中受了程朱理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一脉相承的体现”。陈彩玲论述了《三国演义》中的宗教意识,认为《三国演义》里的宗教意识不是单一宗教现象的孤立显现,而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兼有佛、道思想的综合体,尽管宗教带有负面影响,但展现在《三国演义》中的宗教意识主流仍然是积极的、正面的,有利于避恶趋善、纯洁民风及社会的安定。《三国演义》中所具有宗教意识不是作家的即兴发挥,它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观念、复杂的心理因素和大众的审美理想使然,是长期的民族文化积淀的结果。田同旭从传统的孝道出发,分析了《三国演义》中的孝道,认为反映人之天性美德的孝道,已被历代封建主异化为虚伪的教条。虚伪,正是封建道德最本质的特征,它掩盖了曹操的奸诈、刘备的虚伪、孙权的不义,使他们打着孝道的旗号,到处杀伐,争夺天下,孝道实际上已成为三国社会动乱的祸源之一。傅隆基探讨了《三国演义》的爱刘憎曹思想形成的过程,认为史书上尊刘抑曹的记载、历代士人的尊刘贬曹倾向、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爱刘憎曹思想,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思想倾向,而是一种审美感情,这种审美感情制约着小说全部人物和情节的构思和创造,因而“爱刘憎曹”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灵魂。否则,就不会有《三国演义》这部伟大小说。史友仁等对近年在许昌高庙出土的明弘治六年(1493)《重修魏文帝庙记》和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创建玉皇阁记》两通碑刻进行研究,认为对曹丕的一尊一贬,说明明嘉靖本(1522)《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之前,汉魏故地

许昌是尊曹的。在这之后,由于受嘉靖本的影响,许昌才开始贬曹。欧阳代发分析了《三国演义》中的君臣关系,认为“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是蜀、吴、魏三国不同的君臣关系。师友关系的描写是对君臣大义的冲破,并非历史的真实图景而带理想色彩。《三国》君臣关系的描写,是对先秦士人精神的发扬,反映了作家的理想和愿望,显示出对现实的超越精神。曾良分析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周瑜、司马懿与君主的关系,认为他们的君主关系是十分复杂而微妙的,凡君臣关系和谐之时,便使人世的才智得到发挥;反之,便抑制其才智的发挥。刘备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主要体现在取西川之前,此时诸葛亮的才智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之后,刘备骄狂,刘禅昏庸,心皆疑亮,使其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造成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吴主兄弟与周瑜之间一以贯之的鱼水关系,使周瑜的才智发挥始终处于最佳状态,故能在短暂的一生中做出伟业。司马懿同曹氏四代君主关系最为复杂,他曾被封、被疑、被贬,但他深明韬略,隐忍不发,故最终能得到曹丕、曹睿的信任,大展才智,成为魏晋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段启明认为《三国演义》主要通过所谓三绝:孔明、关羽、曹操的言行所表现的道德观念,不同时代的人所见是不同的。人们对三绝的认识,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而三绝作为《演义》塑造的艺术形象,早已是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奸诈残忍的曹操,义重如山的关羽,从肖像到性格,都是罗贯中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尽可评说,却不能改变形象的本来面貌。作为艺术形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产物,是那个时代美学思想的结晶。

三、从新的角度,审视《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已为众多学者关注,研究成果颇丰。这次会议,不少学者从新的角度,审视《演义》的艺术成就,新见颇多。曲沫认为《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不是“虚实”所能指陈,实乃作者主观意识对历史存在的主体超越,即作家伟大人格和美好心灵的投影与熔铸。而且达到一定主体超越的小说艺术作品,都表现出一种超验之美,具有新奇与非经验所能认知的美学特征。而《三国演义》的超验之美,表现为距离美、模糊美、神秘美、传奇美等等。正由于这些艺术成就,使《三国演义》超出了其它历史小说,久传而不衰。刘永良认为《三国演义》深受诗词曲赋的影响,具有诗意化的独特风格。作者尤其善于化用诗赋的意境,使小说情节具有浓郁的抒情氛围,产生了优美的意境,同时也有助于刻画人物的丰富复杂的性格特征。陈辽认为《三国演义》写哭泣,可见政治,可见谋略,可见人物性格,确实是《三国演义》的一绝。郑铁生分析了《三国演义》叙事形态与历史的现实时空形态的差别(其实质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认为这种差别体现了叙事主体的控制和调度,形成小说审美价值本体的基础。范道济认为《三国演义》在叙事格局的设置上,将最精彩的笔墨给了蜀汉集团,全书叙事速度最慢,情节密度最大的均集中在蜀汉集团的诸葛亮与关羽身上,从中看出作者在叙事时距控制过程中,表现出他们审美理想与道德情感的投入。赵庆元从意象论的角度,透视罗贯中制造的“诸葛亮现象”,认为罗贯中展开想象的翅膀,运用传统意象与神话意象相结合的方法,把历史人物诸葛亮营构成审美意象,传递出缠绵回荡的悲壮情感,树立起理想“人格”的榜样。曹巍从接受美学角度分析诸葛亮形象,认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是一个集天下美德于一身的智慧超人形象。这一形象有其历史演变过程,最后定格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它是作者和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蕴涵了民族群体“欲念”和审美期待,具有永恒的历史和文化魅力。石磷认为诸葛

亮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思想复杂的政治家典型,其思想深处,儒家思想是主导、是核心,同时又兼容了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各家思想。然而,他的思想不符合历史潮流,不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他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身处乱世而秉持儒家思想以救之;虽达乎天时却又勉力尽人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智慧让位于忠贞、智性人格臣服于德性人格,因而有不明智之举。这三方面交织在一起,便使孔明悲剧有了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的思想底蕴。作者是深深爱着自己笔下的悲剧主人公的,在诸葛亮这一艺术形象身上寄托着作者的政治理想。诸葛亮的悲剧正代表了作者政治理想的破灭。更为可悲的是,作者为历代忠臣义士所树立的楷模诸葛亮又被千百年来无数读者所景仰、所褒扬,以至于酿造了许许多多历史的悲剧,缔造了一段一段悲剧的历史。这恐怕是有悖于作者初衷的更深层的悲剧。雷勇从文化角度,分析关羽形象,认为“关羽形象还是一个类型化、道德化的化身,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有一定的个性成份。最成功之处是写了失败的英雄,最大的遗憾是性格分裂。王光浒分析了关羽形象典型化的演变,认为罗贯中依据历史关羽“忠、义、勇”的本质特征,利用民间传说把关羽神化、戏曲艺人对关羽美化、讲史“平话”对关羽虚化的材料进行既神似又形似的塑造,使关羽成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奇人”典型,表现了作者高超的演变艺术技巧和对关羽形象演化的美好动机。王枝忠论述了以往很少有人论及的司马懿,认为司马懿是一位“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素有大志”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三国后期曹魏方面军、政两界最重要的角色,是由魏过渡到晋最终结束三国纷争、实现国家新的统一的关键人物。

四、开拓了研究领域

不少学者从文化方面研究《三国演义》及其传播与影响。王子宽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产生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中,又丰富了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民俗信仰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以正统形式表现的一统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的最为可贵的部分,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强大的依据与基础,这种一统思想今天仍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宋培宪把体现在《三国演义》中主要正面形象身上的忠上、仁下、义友的道德品质,刚勇、睿智、文武兼擅的杰出才能,建功、立业、垂史的政治理想,以及围绕上述风采与理念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与追求,概括为“三国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对现代理想人格的构建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有积极的意义。孟海生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浓墨重笔塑造了关羽,完成了由人到神的历史任务,是形成和发展关公文化的重要里程碑”。“关公文化已经存在并发展了千余年,到今天,它不仅仅在香港、澳门、台湾,在南亚各华侨聚居地,而且在异国他邦,诸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关公都以他自己的人格、道德、行为感动着更多的人,以他的神威庇护着飘零世界各地的处境与地位千差万别的中国人和华人后裔,成为143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严密组织共同拜祀的神,在整个汉文化圈内发生着巨大影响,这种文化现象新局面是有着极深刻的内涵与外延因素和力量的。”薛晓铃认为“《三国演义》对关羽的造神作用功不可没。关公已成为千百年来民族崇拜的偶像。由关公而形成的关公文化也已成为一支生气勃勃、波澜壮阔、无限发展的民族文化”。“关公一身正气,其表现的忠、义、勇已作为一种民族美德,博大精深,是关公文化的精髓的基石”。李时人认为《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它在中国的影响以及周边国家的影响,已超出艺术成就的影响。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它已形成了社会精神现象。《三国演义》是封建时代

后期的文化精典,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龙步根、韩国的金晓民、台湾的陈益源分别介绍了《三国演义》在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的传播与影响。

关注比较研究,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良好的开端。邱岭将《三国演义》和日本的《太平记》进行比较,特别以楠木正成与诸葛亮为例进行比较,认为《太平记》创作时参考借鉴了三国故事,《太平记》中楠木正成的原型,可能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王增斌将《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残唐五代史演义》进行比较,认为“两书写作上有其前后因袭关系。其题材主题创意写作等方面也有其一脉相承性”。从两书体现罗贯中历史小说创作悲剧观看,《残唐》较《三国》,天命天数已减弱,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社会历史更替认识的进步性。罗开玉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的人物品题进行比较,认为《三国志》品题与被品题的主角是名士,而《演义》品题与被品题的却主要是各争霸集团中的首脑及其僚属,且其崇刘贬曹态度明显。

此外,喻镇荣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对《三国演义》中的煮酒论英雄、智激周瑜、舌战群儒、击鼓骂曹等故事进行逻辑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理解把握《三国演义》的精神。

五、回顾以往与展望未来

这次会议开在世纪之交,因而有不少学者回顾了以往《三国演义》研究的情况,展望了新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前景。胡世厚回顾了20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中,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研究《三国演义》,把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特别是近20年,研究成果累累,出版专著(包括论文集)90多种,发表论文1500多篇,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的各种不同版本,在作者与作品研究方面都有新的见解,新的突破。尤其是从应用角度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刘世德提出今后应加强应用研究、版本研究,重视普及与传播。沈伯俊就如何在新的世纪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提出了四条建议:1、新的突破必须以版本研究为基础;2、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3、必须重视和加强研究史的研究;4、努力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万润保提出要开拓研究领域,研究神秘文化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周文业提出将《三国演义》各种版本和研究著作上因特网,运用现代化的手段,研究《三国演义》。

会议期间,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召开了第二届理事扩大会,推举了第三届理事,推举刘世德为会长,章培恒、胡世厚、陈辽、沈伯俊、石昌渝、齐裕昆、杨建文为副会长,沈伯俊为秘书长(兼),黄钧、杜贵晨、竺青为副秘书长。

会议商定,第13次《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5月在芜湖召开,由安徽师范大学承办,讨论的中心议题为《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比较研究、《三国演义》与安徽。

(责任编辑 降大任)